

徽商精神的历史源起、三维定位及科学内涵

王雅琴

(安徽艺术学院 美育与高等艺术教育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011)

[摘要]徽商的精神内涵十分丰富。从徽商精神的历史起源来探析,可以发现徽商精神既具有文化层面的共性,更具有地域层面的特性。徽商精神在几百年徽商的经济活动、思想观念、道德标准中,逐渐成为一种价值引领和行为约束,这也是徽商在诸多商帮中能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徽商精神以理想信念为核心,以思维模式、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为基础,形成了较为稳固的三角核心模式,并最终形成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锐意进取的奋斗精神、贾而好儒的诚信精神三个最具代表性的科学内涵。

[关键词]徽商;徽商精神;进取;奋斗;诚信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23.03.013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23)03-0094-07

明清之际,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显著。这一时期,山西、山东、安徽、广东等地逐渐形成以地域经济为特色的区域性商帮,其中以徽商和晋商最具代表性。正如明代万历时人谢肇淛在《五杂俎》里所说的“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今安徽),江北则推山右(山西的别称)”。在明代中叶到清代乾隆末年长达三四百年的历史中,徽商资本雄厚,实力强大,富可敌国。到清中叶,徽州盐商的资本总量达到8000万两。明清之际,江浙35名大盐商中,徽商有28名。徽商以盐业、茶业、木业、典当业为主,涉及米、布、丝绸、文房四宝等,经营范围广泛,门类众多。为了扩大经营范围,徽商不仅走出徽州,走向全国各地,还积极向海外拓展,遍及朝鲜、日本、泰国等地,“远服南越,与岛夷为市”,具有了国际性商业活动的性质。

一、徽商精神的历史源起

(一)自然地理环境所迫

徽商的产生首先是源自于徽商艰苦的生存条件,这是徽商兴起的首要客观因素。由于北方战乱,古徽州历史上曾出现晋、宋、唐三次较大规模的移民,从而带来大量人口。古徽州地处皖浙赣三省交界之地,群山环绕、平原土地稀少,土地贫瘠、农耕生活难以满足大量人口的生活需求。“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休宁县志》记载“徽州介万

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赡一”。“吾邑之不能不贾者,时也,势也,亦情也。太史公之时,江淮以南,地广人稀,食土之毛,人足自给,无事贾也。乃今邑之人之众,几于汉一大郡,所产谷粟不能供百分之一,安得不出而糊其口于四方也?谚语:‘以贾为生’”^[1]。尤其是到明中叶以后,由于农田稀少,毁林造田,从而导致水土流失、旱涝频发^[2]。明代顾炎武先生指出:“徽郡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粮食极度缺少,人们生活难以继,“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在这样的背景中,走出大山,放弃农耕,转向手工业和商业既是无奈之举也是明智之举。因此顾炎武说“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明清之际,70%左右的成年男子经商。明代文学家汪道昆(今徽州区人)《太函集》记载:“吾乡业贾者什家而七,赢者什家而三。”生存的压力使得当时很多徽州人家不得不抛弃传统的“父母在,不远游”的思想,开始走出大山,寻找生活的新途径。

(二)社会经济发展所需

唐末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尤其是南宋定都临安(杭州),徽州成为畿辅之郡,政治上的地位提升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而且徽州与杭州距离并不远,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徽州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

[投稿日期]2023-06-01

[基金项目]2023年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专项课题(编号:2023CXZ027);2022年安徽省教育厅社科重大项目(编号:2022AH040272)

[作者简介]王雅琴(1980-),女,安徽舒城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文艺理论研究。

徽州逐渐融入当时的江南经济发展圈。宋代土地私有制发展迅速,整个社会商品经济十分繁荣,特别是明中叶以后,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各地商品贸易非常活跃,不断开辟出新的商路和商贸城镇,全国性市场逐渐形成。白银也在此时开始大规模使用,商业贸易和商业资本兴起,这些都为徽商的崛起提供了政治和经济条件。

聪慧的徽商们并不只是经济发展的旁观者,他们积极融入社会发展中,很快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历史上很多徽商起初都是因困苦的生活所逼被迫从大山中走出来,但他们很快就认识到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无限商机。他们把长江下游盛产的布匹、丝绸运到上游地区,把长江中上游盛产的竹木、粮食运到下游地区^[3],将茶叶、木材、绸布、粮食等通过长途贩运推向全国各地,徽商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加强了各地经济联系,扩大了全国商品市场,有力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城镇的繁荣。在长途贩运中,各类商品货畅其流,比如徽商将木材资源地从徽州本土拓展到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上游的云贵川地区,在明代晚期形成徽商的第一个高峰。徽商们在与各地进行商业贸易的时候逐渐在江南地带,如松江、苏州、杭州、南京等地获得了经营优势,发展壮大。徽商经营的范围甚大,地域极广,影响至深。清代康熙平定“三藩之乱”以后,社会逐渐安定下来,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生产恢复,人口大幅度增加,盐的销售量大增,徽州盐商迅速发展,在两淮盐业中逐渐占据优势,到乾隆年间,一度具有“全国金融皆可操纵”的实力^[4],具备了影响全国经济命脉的实力。

因此,徽商的兴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聪明的徽商们准确把握了这种历史发展带来的商机,在各类商贸活动中成为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

(三) 儒家文化底蕴所现

徽商能发展三百余年,原因很多,但徽商在十大商帮中独居特色很大程度上则是因为徽商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他们因为客观原因不能走读书、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之路,但却无时无刻不受这种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他们将这种思想体现在他们的经营理念、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之上。这种影响与其他商帮相比更为深远,由此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贾而好儒”。

1. 对儒家文化的继承

徽州文化的主体是本土的新安理学,这是徽州

文化最为基础的部分,也是徽文化形成的主要思想来源。徽州地区孕育了诸多文化大师,宋明理学奠基人程颐、程颖,集理学之大成、新儒学的代表朱熹,徽派朴学的领军人物戴震等祖籍均在新安江畔的徽州。在经历了历史上的三次移民,徽州文化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中原文化与山越文化不断融合,但以新安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却贯穿于徽州人文化脉络的始终。他们将外来文化与儒家文化相融合并不断发展与创新,尤其是在其经营活动中既秉承儒家思想的行为准则,同时也不断创新与发展,从而创造出徽商鼎盛的历史。

2. 对儒家文化的推崇

作为徽商最为显著的特征,“贾而好儒”集中体现在徽商们认为经商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谋生手段,而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才是人生目标,儒家思想是为人处世、行为规范的标准。在很多关于徽商的史书记载中都有徽商孝敬父母长辈、乐善好施、邻里和睦的记载。他们自己没法通过读书完成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那就通过重视文化教育、兴建学堂、捐资办学、刻书藏书、修建学院等方式来实现自己对读书的心理满足。歙县商人郑孔曼在外出做生意时还随身带书阅读,并结交各地文人学士^[5],有些徽商还是诗人,与文人吟诗写文,参与各种文人活动,成为兼具商人与文人特性的儒商^[6]。

3. 对儒家文化的思辨

儒家文化对徽商影响深远,但具有开拓性的徽商并不是一成不变地继承儒家文化,在长期的经商实践中,他们一方面秉承儒家文化的传统,另一方面也积极思考,对儒家文化中商农关系进行思辨性批判。明代商品经济发展迅速,随着不断繁荣的经济和各类商帮的成功,人们开始对农商关系进行重新认识,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开始受到质疑或动摇。清代徽州学者俞正燮说:“商贾,民之正业。”作为商人的代表徽商们更是对这种关系进行了深度思考。徽商们以自身的经历发出“各得其所,商何负于农”的疑问。他们对重农抑商政策进行探索性的思考,并以实际行动刷新了人们对商人的理解。徽商以成功的商业活动改善了生活,让贫苦百姓走上致富之路;以兴办学堂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客观上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以捐资修筑道路、新建桥梁、改善公共设施,提升了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条件;在各地进行收购贸易,形成了一个商品集散地,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等。徽商们在这样的实践活动中完成了对重农抑商文化传统的思辨批判。

二、徽商精神的三维定位

对于徽商的界定,学界通常认为是徽州的商人。徽州也就是一府六县,即徽州府和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婺源。在这些地区形成的地域性商人个体或团体统称为徽商。徽商的兴起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但是它对人们的思想情感、价值理念、行为模式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跳出单纯的经济范围,成为辐射政治、经济、社会、民俗、艺术等诸多方面的社会文化现象。在思想层面,以“徽骆驼”为代表的徽商精神体现了徽州商人勇于开拓、百折不挠、锐意进取、艰苦奋斗的品德,对世代徽州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文化层面,徽商尤为重视儒家文化,并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很多徽商在衣锦还乡之时兴学重教,开办学堂、义塾,修建宗族祠堂和牌坊;关注民生,捐资筑桥修路、修建育婴堂;崇文重化,建筑、绘画、雕刻等,充分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将商农思想融会贯通,形成亦农亦商的和谐局面。在社会层面,徽商的发展客观上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他们以创新性的经营理念、管理方式和商业模式造就了“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的商业盛世,在芜湖、安庆、南京、苏州、杭州以及长江、运河交汇处的扬州一带建立商业中心,对现代城镇化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徽商的影响深远,其中徽商精神最具代表性。

精神是社会意识的范畴,在社会发展中以潜移默化和根深蒂固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之中,并对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人们产生特定的力量导向和价值引领。徽商精神既具有文化层面的共性,更具有地域层面的特性。徽商精神在几百年徽商的经济活动、为人处世、道德标准中,逐渐成为一种价值引领和行为规范,影响了世世代代徽州地区的社会文化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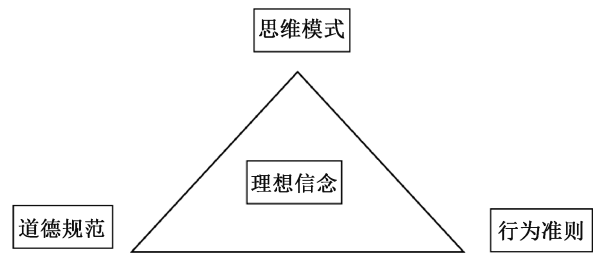


图1 徽商精神的三维定位

我们将徽商精神进行总结概括,可以发现徽商精神在思维模式、价值追求、道德规范、意志品质、文化习俗、行为准则等方面有着丰富的内涵。徽商精神以理想信念为核心,以儒家思维模式为导向,逐渐形成诚信、进取、敬业、节俭、勤奋、拼搏、求知、勤思、善于沟通等道德品质或道德规范,并以此引领自己的行为准则——团结和谐、以义为利、注重品质、爱国、奉献、守法、慈善等,从而形成稳固的三角核心模式。

表1 徽商精神科学内涵览表

徽商精神的科学内涵	三维定位	核心要义	表现形式
	思维方式	贾而好儒	恪守儒道、崇文重教、坚守家族观念、血缘伦理
开放		眼光向外、世界眼光、天下为怀、战略思维、创新文化	
创新		通权达变、革故鼎新、审时度势,开拓创新、勇于探索、敢为人先	
竞争		商机至上、审时度势、出奇制胜	
道德规范/道德品质	诚信	诚信经营、讲信修睦、言而有信、以德治商、以诚待人、信通天下、讲信重义、童叟无欺	
	进取	百折不挠、矢志千里、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矢志追求、不怕挫折、执着追求、不畏艰难、拼搏奋勇	
	节俭	虽富犹朴、克勤克俭、奉勤俭、勤俭节约	
	勤奋	不辞劳苦、“徽骆驼”、业精于勤、勤劳执着、艰苦奋斗、勤劳克俭	
	求知	尊儒业儒的求知精神、勤思善学	
行为准则	以义为利	以义接物、重义轻利、诚实守信、以义取利、以德治商	
	团结和谐	以众帮众的团队精神、团结协作、同舟共济、广结人缘、以和为贵、互帮互助、同舟共济、善于沟通	
	爱国	使命意识、社会责任、社会担当	
	奉献	热心公益的奉献精神、回报社会	
	守法	守法经营、知法守法的法律精神	
	慈善	扶贫助弱、经世济民	
	注重品质	精益求精、质量之上	

从已有对徽商精神的总结可以看出,徽商精神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但作为最核心最凝练的精神层面,徽商精神既要体现思想意识、价值取向等共性的层面,还要充分展现其特有的个性和价值。在这样的定位指向下,徽商精神的核心要素可以归纳为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锐意进取的奋斗精神、贾而好儒的诚信精神。

三、徽商精神的科学内涵

(一) 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

徽商之所以能发展三百余年,延绵七百余年,最为重要的就是具有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这既是客观条件的必然又是主观能动的创新。

1. 突破地理条件约束,勇敢开辟商业道路

徽州地区处于崇山峻岭之中,位于皖、浙、赣三省交界处,《徽州府志》记载“东有大郭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厄”。四周自然地理条件艰苦,生存环境恶劣。虽然人多地少,生活困顿是推动徽州人走出大山的直接原因,但从深层原因看却是徽州人具有开拓创新的勇气。面对困难时他们能以开放的精神和开拓的魄力走出封闭的山区。在封建社会,背井离乡、外出创业是一件极具勇气的行为。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背井离乡多是一种万般无奈的选择。对于古徽州人来说,外出创业则更加不易。一方面徽州山地丘陵占总面积90%,四周几乎全部被群山环抱,而且古代交通不便,人们需要自备干粮,步行外出,仅仅是走出大山就充满艰辛。比如徽杭古道是古时候联系徽州与杭州的重要纽带,虽然全长只有25千米,但却位于崇山峻岭之中。徽商们身负重物,仅靠肩挑,举步维艰。位于安徽省绩溪县的“江南第一关”,山势险峻,常有山洪暴发、山石滑落,一边是万重高山,一边是悬崖峭壁,商人们带着马匹,驮着茶叶等货物,稍不留神就会掉入万丈深渊。明朝万历年《歙志》记载:“古道出入谷间,无砉步夷旷,险绝处高则架木为栈,低则垒石为塘。”很多古道都是徽州人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另一方面外出经商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十年八年不能还乡是常有之事,再加上关卡勒索、瘟疫病变、人生地不熟,不仅不一定能经商成功,还往往客死异乡,因此对于徽州人来说外出经商就是与家人的生离死别。

然而徽州人不仅勇敢地走出大山,而且以开拓的精神突破陆路的障碍,改从水路探索创新。徽州

境内虽然山势崎岖,交通不便,但却拥有丰富的水系——新安江、青弋江、水阳江等多条水系,这些为徽州商人进行长途贩运、交换粮食、运输物资提供便利。比如,徽州人多地狭,粮食缺口大,粮价高。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中道:“江南米价,徽独高。”为了盈利,徽州商人大量贩卖粮食,将四周平原所产的粮食贩入徽州,“上接闽广,下接苏杭”。其中包括重要的三条水路:一是沿鄱阳湖北岸的饶河水系,自江西贩粮入徽;二是逆水阳江、青弋江等水系,自皖南沿江平原一带,水陆并举入徽州;三是从杭嘉湖平原出发,顶着新安江之水,一路逆流至徽州。在明代徽商黄汴所著的《一统路程图记》中记载水陆交通干线计215条,开辟了江北、江南等多条水路商路。

2. 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大胆创新商业模式

徽商走出大山外出创业十之八九都是生活所迫,但在四处经商的过程中他们开始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进行思索,在思想观念上开始逐渐形成“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儒贾观,认为商农“异术而同道”,并大力发展商业,丰富经营内容,创新经营模式。在徽商的经营范围内,除了具有代表性的盐业之外,他们还经营茶叶、木材、粮油、棉布、丝绸、陶土、药材、铁器、徽菜、文房四宝,甚至各种杂货百货等,还涉足手工业生产,如开铁矿、染坊等,其中以盐、典、茶、木最为著名^[7]。可以说只要是能盈利的,他们都愿意进行尝试,并根据不同的经营内容采取形式多样、机动灵活的经营方式和贩卖方式。

商海中的竞争自古至今都是残酷而严峻的,尤其是在封建社会,社会对商业活动进行贬低和压制。要想白手起家,战胜对手就必须不断创新。因此除了丰富经营内容之外,还需要在形象品质和经营管理上提升自我,培育先进的经营理念和富有远见的经营之道。从形象品质上,徽商继承和发扬了儒家思想中的讲诚信、重质量的理念,崇义尚信,以义为利,公平交易、以诚待人,从而树立了品质高、口碑好的儒商形象。在经营管理上,徽商根据不同商业活动更新经营模式,比如在筹资方式上采取合资经营和合伙经商的方式;在商品贩卖方式上买贱卖贵、连锁经营;在审视商品市场时,细分市场的需求,根据供需关系及时调整经营时间和地点;在经营机制上采取类似现代的股份制、合伙制、经理委任等形式。另外,在资本组合方式上形成了独资经营、合资经营、贷资经营、承揽经营、委托经营等诸多类型;在经营管理方式上形成独家经营、合伙经营、轮流经

营、聘用经营、分守经营、承包经营、委托经营、领本经营等多种方式^[7],而且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已经探索性地出现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相互分离的经营模式。徽商们还通过“伙计”、口岸设立办事机构,利用会馆、公所、同宗、同族人氏了解市场行情,并根据市场调整经营项目和经营地点,“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计屈伸”,在市场中灵活多变地制定融资、经营、营销、管理等方法,从而获得高额利润。

(二) 锐意进取的奋斗精神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一,也正是徽商的真实写照。

1. 吃苦耐劳、勤奋踏实的“徽骆驼”形象

徽商有着“徽骆驼”“绩溪牛”之称。“徽骆驼”的称呼源自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徽州绩溪人胡适为江苏溧阳新安同乡会题写的“我们是徽骆驼”的条幅^[8]。虽然徽州并没有骆驼,但“徽骆驼”却十分形象生动地表现出徽商的品格和精神。台湾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中将“徽骆驼”解释为“比喻徽州人正义奋斗、宁死不屈之性格”。“徽骆驼”包含了很多内容,比如骆驼在沙漠中吃苦耐劳、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任劳任怨、毫不抱怨的奉献精神;团队协作、相互帮助的合作精神;执着信念、心怀理想的追求精神;直面艰苦、越挫越勇的无畏精神等。但其中最为突出和最为凝练的精神则是骆驼埋头苦干、吃苦耐劳、一步一个脚印勤奋踏实的形象。因此,虽然徽州并不产骆驼,但“徽骆驼”与徽商之间却有着高度契合的精神内涵。

骆驼生活在广袤的沙漠之中,植物稀少、干旱缺水,生存条件极差。为了能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骆驼以它极强耐渴的身体结构、适应高温环境的身体外形、出色的食物适应能力成为“沙漠之舟”。这与徽商的生存环境极为相似。历史上,徽州不少居民是因为两晋“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与黄巢起义、两宋“靖康之乱”躲避战乱而迁入徽州地区。移入徽州之后徽州地区人多地少、气候恶劣、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粮食极缺。“吾郡为东南区而休邑,又居郡之上游,崇山复岭,列峙如屏……顾以地险人稠,土疏气瘠,生理鲜少。恒产维艰,一遇水旱凶荒,往往轻去其乡流移,不复而故”^[9],徽州人的生存面临极大的挑战。然而徽州人和骆驼一样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积极进取,勇往直前。他们大多出身贫寒,带着家中为数不多的积蓄甚至是借款,“衣敝食疏”“勤于山伐,能寒暑,恶衣食”,走出深

山,四处闯荡。他们没有经商资本就当伙计,没有经验就拜师为徒,胸怀“光宗耀祖”的理想信念面对各种挫折和磨难。为了实现理想,他们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忍辱负重、踏踏实实、勤勤恳恳,正如同一匹匹在艰苦的沙漠之中不断前行的“骆驼”。

2. 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

“驴上徽州,不死不休”,这是对徽商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精神的写照。古往今来,在商海里拼搏奋斗的人数不胜数,但能坚持不懈、坚韧执着却着实不易。徽商们秉承“欲享福却无福,无福享福真无福;肯吃苦便不苦,不苦吃苦永不苦”^[10]的思想。正是这种不辞“利涉之艰”、勤俭节约的思想理念,使徽商们在商海里沉沉浮浮,身经百战,并最终在十大商帮中脱颖而出,发展三百余年。面对各种挫折,徽商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很多文献中都记载了徽商百折不挠的奋斗故事:如明代徽州歙县人江遂志北上经商,期间经历遭人诬陷、资产没收、翻船失事、年近五十等磨难,但仍旧“往来金陵淮扬诸盐地”,最终发财致富;歙县徽州望族鲍氏鲍志道年少家道中落,十一岁外出经商,出门时仅剩一文铜钱,先后辗转金华、扬州各地,从学徒做起,自强不息,最终成就了鲍氏家族。这些徽商们无论是深处逆境还是家道中落,都以百折不挠、异于常人的坚韧与毅力体现了一股不服输、不认命的拼搏精神。

(三) 贾而好儒的诚信精神

徽商的发源地是儒学发展新时代的代表、南宋儒家大师朱熹的故乡,因此与其他商帮相比,徽商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更为深远。徽商精神中所蕴含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等精神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息息相关。有不少徽商本身就是读书人,或者深得儒学影响,具有儒士风度。戴震在《戴节妇家传》中指出:“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为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然生民得山之气,质重矜气节,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徽商中弃儒从商者有之,商而后儒者亦有之。休宁巨商程锁早年习儒,后来经商,获得成功之后又习儒业,“迄今遗风具在,不亦翩翩乎儒哉”。

1. 崇教兴学是徽商崇儒外在体现

徽州民居的楹联上写着“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古徽州人赵访在《商山书院学田记》里记载:“私塾遍设,社学林立,县学充分发展,书院众多,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琅琅书声,不绝于山水天地之间。”徽商在自己发达之后,回乡兴办

学堂。朱熹在《送李伯谏序》中说:“国家建立学校之宫,遍于郡国,盖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纵使自己因为家贫或其他原因未能报效祖国,也会在有一定经济基础之后,为后人或乡人营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他们捐资兴学、刻书藏书,修方志、邀讲学。对族中贫困好学的子弟进行资助,“富而教不可缓”。康熙《徽州府志》中记载徽州书院有54所。两淮总商鲍志道“捐金三千复紫阳书院,捐金八千复山间书院,功在名教”^[11]。

2. 先义后利是徽商崇儒的内化思想

儒家文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徽商对崇儒的外化行为上,更体现在内化思想上。程朱理学产生之后,儒学思想构成了徽州文化的重要内容,还塑造了徽商外出经商和为人处世的基本品格和道德追求。无论是做官、经商、行医都要以儒家思想为基本准则,即使是在唯利是图的商业领域中,徽商也秉承儒家的道德规范,以儒家思想来看待义利关系,将儒家传统中的仁义礼智信融入经商论道之中,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成为先义后利、坚守诚信的名副其实的“贾而好儒”的儒商。

徽商们以辩证的思想来看待义与利的关系,逐渐形成“贾为厚利,儒为名高”“以义为利,不以利为义”的义利观,并将此作为职业道德观。他们认为义与利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转化的,只有具备以诚待人、童叟无欺、注重信誉、保证质量、诚实经商的“义”才能获得长远的“利”,为了“义”暂时失去“利”也是值得的。道光年间黟县商人舒遵刚曾对义与利的关系进行了剖析,认为钱如流水,义则是流水的源头,只有因义用财才能让流水源源不断、长流不竭^{[12]276-277}。很多商人都践行这样的义利观。如吴南坡“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从而为自己的商品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休宁商人刘淮在大灾时期不仅没有大发灾荒财,而且减价出售囤聚之粮,甚至搭建粥棚“以食饥民”,是典型的先义后利;徽商汪平生,“正德年间,岁大歉饥,蓄储谷粟可乘时射倍利”,而他“不困人于厄,悉贷诸贫,不责其息,远近德之”;著名红顶商人胡雪岩为了保证胡庆余堂国药号的质量,宁愿将未售完的止痒花露倒掉也要保证产品的质量,胡庆余堂还向账房内悬挂“戒欺匾”,时刻提醒自己诚信为本;茶商朱文炽在经过长途贩运而由新茶变成的陈茶贴上“陈茶”标签来诚信告知顾客;胡开

文墨店老板胡余德在发现有部分墨锭不符合质量要求时,不仅要求各店停售该商品,而且高价回收已出售的墨锭,以保证质量;黟县商人胡荣命为维护自己苦心经营五十余年的店铺招牌,拒绝别人重金租赁他的照片;新安药业的“保和堂丸散”虽声名远扬,但绝不高价贩售,“药有定价,宁薄息而售,世不二价以拘人”^{[12]278},等等。历史上很多徽商如鲍雯、许宪、汪通保、吴鹏翔、孙廷熹、许文才、胡名山、程家第、江义龄、江灵裕、汪应浩、许天志等都有诚实经商、坚守以利取义的行为,从而为徽商获得了儒商的美誉。

徽商的兴起与鼎盛是漫漫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片段,但徽商精神的价值却具有永恒性和时代性。对徽商精神的准确把握和科学定位可以深入探寻徽商的起源、发展和兴盛的原因,从而挖掘其现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徽商精神中所包含的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锐意进取的奋斗精神、贾而好儒的诚信精神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和追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 [1]张涛,谢陞. 明万历《歙志》[M]. 合肥:黄山书社, 2014:415.
- [2]谢慧,杨德忠. 从徽州楹联文化看徽商精神[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39(6):167-169.
- [3]钟艳. 徽商精神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启示[J]. 理论建设,2020,36(2):109-112.
- [4]汪枫. 徽州文化概览[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8:30.
- [5]吴铭. 徽商为何“贾而好儒”[N]. 企业家日报,2011-01-30(02).
- [6]周生杰. 简论明清徽商的诗歌创作[J]. 文学评论,2012(3):77-84.
- [7]栾成显. 试论徽商的开拓创新精神[J]. 中国区域文化研究,2019(1):113-127.
- [8]李琳琦. 论徽商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 安徽史学,2014(2):114-121.
- [9]廖腾烽修,汪晋征纂. 休宁县志[M]. 影印本. 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51-52.
- [10]解维汉. 古镇老村楹联[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7:92.
- [11]唐力行. 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M].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32.
- [12]张海鹏,王廷元.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M]. 合肥:黄山书社,1985.

The Historical Origin, Three-Dimension Position and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e Spirit of Huizhou Merchants

WANG Yaqin

(Research Center for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Higher Art Education, Anhui University of Arts, Hefei, Anhui 230011, China)

Abstract: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Huizhou merchants is very rich. From its historical origin, the spirit of Huizhou merchants not only enjoys cultural commonality but also the uniqueness of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For hundreds of years, the spirit of Huizhou merchants has evolved gradually into a value guidance and behavioral standards in their business activities, ideological concepts, and moral standards, which, in turn, is an important reason why Huizhou merchants stand out among many other Chinese business gangs. Specifically, the spirit of Huizhou merchants takes ideals and beliefs as the core, and forms a relatively stable triangular core model based on thinking mode, moral norms, and code of conduct; accordingly, the three most representative scientific connotations have come into being in the spirit of Huizhou merchants, that is, the pioneering and innovative enterprising spirit, the enterprising spirit of struggle, and the spirit of honesty and trustworthiness featured by Confucianism.

Key Words: Huizhou merchants; the spirit of Huizhou merchants; enterprising spirit; struggle; honesty and trustworthiness